

韩国的甲午战争研究

——日本侵略主义、甲午改革及亚洲民众的视角

王贤钟

一、甲午战争的定义及其研究概况

19世纪后半叶东亚国际关系的变化,表现为传统东亚国际秩序之朝贡体制的崩溃,进而被伴随着西欧帝国主义列强政治、军事侵略而来的不平等条约体制所取代。甲午战争^①为上述的东亚历史变化提供了一个重要契机。甲午战争是指围绕着争霸朝鲜,清国与日本两个邻国之间所发生的武力冲突。至于这样一种性质的甲午战争因何爆发,固然要从19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东亚秩序之中,清日两国的政策变化里寻求原因,而其直接起源通常被认为是1894年东学农民战争的爆发。

东学农民战争是一场席卷朝鲜全国的农民起义,其过程从1894年2月全罗道古阜农民起义以及4月茂长第一次起义开始,经过1894年10月第二次起义,直至1895年3月全琫准等领导人被处死为止。1894年当时的历史状况,可以概括为自19世纪40年代以来围绕着构筑东亚秩序而展开的西方列强与东亚各国之间的争夺,以及围绕着朝鲜问题而展开的清日之争。关于这场战争,韩国称之为“清日战争”,日本称为“日清战争”,中国则称“甲午中日战争”或“第一次中日战争”。不幸的是,正是这场战争将整个东亚卷入了此后长达半个世纪的战争漩涡。因此,唯有正确理解1894年之际东亚国际局势及其历史,才能准确地理解此后的近代东亚历史。

迄今为止,韩、中、日三国为纪念1894年甲午战争,先后召开过多次学术会议,并建造了战争纪念馆。中国大约以10年为周期,举办大规模的“甲午中日战争”学术大会,已经积累了许多的史料与相关研究成果。自从1945年战败开始自我反省战争责任以来,日本有关甲午战争的研究一直相当沉寂,直到甲午战争爆发100周年前后才开始探讨日本国民的相关战争经验及其记忆问题。韩国也是以1894年农民战争100周年纪念为契机,开始集中探讨甲午战争爆发与甲午改革、农民战争的关系,却至今仍未就甲午战争本身提出一个独自の学说。

二、1994年以前韩国学界的甲午战争研究概况

从1945年韩国解放以来,日本与中国已经对导致东亚三国国际地位发生重大变化的甲午战

^① 原文通篇作“清日战争”,也是韩国学界的通用概念,除著作及论文题目外,正文叙述部分由译者全部改为“甲午战争”,以期与中国学界通用概念一致,特此说明。

争,进行了许多研究。在战前时期,日本学界基于日本帝国的立场,认为这场战争是抵御西方各国侵略、守护东亚和平的战争,从而也否定了甲午战争之后亚洲太平洋战争的侵略性,1945年以后的研究则对上述的战前研究倾向以及殖民侵略进行了反省与批判。至于韩国学界在各个时期有关甲午战争研究的不同主题,详见表1。

表1 韩国学界有关甲午战争研究论著统计(1950—2014)①

分 类 时 期	第一期 1950—1984		第二期 1985—1994		第三期 1995—2004		第四期 2005—2014	
	著作	论文	著作	论文	著作	论文	著作	论文
	国际关系史	8	11	1	9	10	15	10
甲午战争	1	12	1	16	3	17	1	38
东学农民战争	0	2	1	2	2	5	1	9
甲午改革	0	2	1	1	1	2	1	5
思想认识	0	1	0	2	3	9	2	48
社会经济等	0	2	0	1	0	5	4	35
合计	9	30	4	31	19	53	19	168
总计	39		35		72		187	

表1的有关甲午战争的研究动向是以1994年甲午战争爆发100周年为基点,大约以前后各10年为一个周期来进行分析。至于研究主题的分类,则分为19世纪末国际关系史、甲午战争、东学农民战争、甲午改革、东亚及甲午战争思想认识、社会经济以及教科书批判等六个部分。从研究著作来看,1950年至1984年的30多年间仅有9部,到1995年以后则相继增加到第三期的19部、第四期的19部。至于研究论文更是有大量增加,从第一期的30篇,相继增加到第二期的31篇、第三期的53篇、第四期的168篇。有关甲午战争研究的全部著作作为51部,论文为282篇,共计333篇(部)。

首先,在20世纪50—70年代期间,以甲午战争为单一主题的研究著作寥寥无几,作为解放后出版的概论性著作只有李瑄根的《韩国史——最近世篇》(震檀学会,1961年)。该书受到了战前田保桥洁有关日中朝三国外交史及朝鲜近代史研究体系的影响^②,著者只是从韩国史的角度以当时朝鲜国内变化及对应为中心,更加具体地描述了甲午战争前后朝鲜社会的变化。尽管该书未能揭示与此前研究不同的甲午战争,却也具体地叙述了日本的侵略过程。

70年代以后的研究,开始关注朝鲜社会的近代化运动,并出现了试图肯定性地诠释开化派甲申政变、甲午改革等近代改革运动中民族主义倾向的近代史研究。甲午战争与韩国近代史变化进

① 该表系对20世纪50年代以来有关甲午战争研究各个主题研究成果的综合统计。此处的“韩国学界”意指由韩国学者在韩国进行的相关研究,并不包括韩国学者在日本、中国发表或外国学者在韩国发表的研究成果。研究成果的形态分为著作与论文,不包括硕士、博士学位论文。该统计系利用韩国教育学术情报院学术情报服务网(www.riss.kr)、国史编纂委员会数据库(<http://db.history.go.kr/item/level.do?itemId=hb>)做成,其中个别论文可能因为收录到不同的论文集或单行本而出现重复统计。

② 田保桥洁利用实证资料,系统考察了从《中日天津条约》以来的日朝关系,包括东学农民战争与日本干涉朝鲜内政改革、列强干涉、清日开战等问题,主要研究成果有:『近代日鮮關係の研究』(京城、京城帝国大学、1930年)、『近代日鮮關係の研究』(朝鮮總督府中樞院、1940年)、『日清戰役外交史の研究』(東京、刀江書院、1951年)等。

程的相关性研究就是其中一环,其中值得瞩目的便是朴英宰及柳永益的论文。朴英宰在题为《清日战争与日本外交》的论文中,通过分析《马关条约》草案,探讨了日本外交方针的形成以及媾和过程。^①他指出,在当时军事上局势有利以及由于美国调停而掌握媾和交涉主导权的情况下,日本陆军与海军一致主张占领辽东半岛与台湾,使之成为将来攻略东南亚及中国大陆的基地,而日本政府通过协调陆海军双方意见,使媾和条件变得更加强硬。至于以朝鲜独立为名而推进割让辽东半岛的“秘密主义”,最终招致了三国干涉的外交失败。朴英宰在此后的研究中,进一步考察了负责19世纪90年代日本外交的外务大臣陆奥宗光的外交论,并批判了日本学界有关日本外交存在军部强硬理想主义与陆奥现实外交所谓“双重”路线的研究模式。^②他指出陆奥的外交路线所反映的所谓“秘密外交”或“双重外交”之“双重”态度,其实仍是出于日本对外扩张的侵略主义方针。^③

柳永益通过《甲午更张时期日本的对韩政策》一文,批判了此前强调甲午更张他律性的先行研究,指出就是在日本倾力于甲午战争的所谓“消极干涉时期”(1894年7月23日—9月18日),开化派官僚主导了朝鲜的改革,日本只是提供支持,因此本质上应该是“自律的改革”。^④在此后的研究中,柳永益进一步指出日本政府以平壤战役胜利为契机,采取了积极干涉政策,并开始推行业已由日本内阁决定的保护国化政策。这种观点意在否定此前有关甲午更张系由日军占领景福宫以后所扶植的亲日傀儡政权推动的结论,而强调了在一定时期内是没有日本干涉的自律性改革。他的相关研究,可以说提出了试图强调朝鲜独自进行近代改革运动的内在研究模式。^⑤

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研究则主要是围绕甲午战争的外交方面展开,其中代表性研究成果为由韩国精神文化研究院出版的《清日战争前后的韩国与列强》,以及由韩国史研究会出版的《清日战争与韩日关系:关于日本对韩政策形成的研究》两书。上述两书都是将甲午战争与日本的侵略主义联系起来加以批判的一种外交史研究成果。直到纪念甲午战争100周年的国际学术会议论文集《清日战争的再照明》一书的出版,才第一次实现了韩中日三国在相关研究方面的交流与合作。^⑥这本论文集主要探讨了甲午战争时期清国与朝鲜、日本、英国等国间的关系,但仅止于概括整理战争前后外交、战争过程,以及各研究者在20世纪70年代的研究成果,并未能提出新视角、新问题。

综上所述,韩国学界第一至第二期的甲午战争研究,大多是从批判帝国主义列强外交交涉、日本侵略主义的角度来探讨东亚国际秩序的变化。至于战前由日本学者主导的甲午战争研究,并未能上述时期得到批判与克服,而是直到最近时期才从整体的问题意识以及实证角度提出了系统

① 朴英宰:《清日战争与日本外交——以辽东半岛割让问题为中心》,《历史学报》第53、54期合集,1972年。

② 信夫清三郎的研究曾指出在甲午战争时期,日本外交存在着所谓“双重外交”,即外相陆奥宗光的和平主义方针与以战争为目标的陆军参谋次长川上操六等的军部方针,详见信夫清三郎的『日清戦争——その政治的・外交的觀察』(福田書房、1934年)和『陸奥外交——日清戦争の外交史的研究』(董文閣、1935年)。此后中塚明在『日清戦争の研究』(青木書店、1968年)一书中,批判了上述的“双重外交论”,并指出当时日本外交与军部是相互密切协助的关系。

③ 参见朴英宰《清日媾和与美国战争》,《历史学报》第69辑,1978年;《1890年代的日本外交及外交论》,国史编纂委员会编:《国史馆论丛》60,1994年;陆奥宗光与清日战争,翰林大学亚洲文化研究所编:《清日战争的再照明》,翰林大学出版社,1996年。

④ 柳永益:《甲午更张时期日本的对韩政策——针对甲午更张他律论的修正性批判》,《历史学报》第65辑,1975年。

⑤ 柳永益在此后研究中通过考察井上馨公使的保护国化政策以及朴泳孝的独立路线等,批判了日本保护国化政策的失败,却仍是基于近代主义的观点而强调甲午更张的近代性一面。参见柳永益《清日战争中日本的对韩侵略政策:以井上馨公使的朝鲜保护国化企图为中心》,《清日战争前后的韩国与列强》,韩国精神文化研究院,1984年。

⑥ 翰林大学亚洲文化研究所编:《清日战争的再照明》,该论文集收录了金基赫、朴英宰、柳永益、谢俊美、森山茂德、Ian Nish等各国学者的论文。

的批判,则不能不说是一种晚时之叹。^① 进入第三、四期以来,随着对东亚国际关系史的深入研究,有关甲午战争各个领域的研究也进一步深入细致,甲午战争研究史遂迎来了1994年以来的一个全新局面。

三、1995年以后韩国学界有关甲午战争研究的主要观点

自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学界开始从日本内政因素角度寻找日清开战的理由,提出了当时并不存在一个确定的对韩政策的新观点,进而出现了从日本民众的视角考察甲午战争的大量批判性研究成果。^② 相反,韩国学界基于韩国史的立场重新诠释外交史乃至国际关系史的研究成果却寥寥无几,其原因固然在于韩国所留存的有关甲午战争资料原本不多,同时也是因为一直未能确立独立的研究视角与观点,只是停留在介绍日本及欧美学界研究成果的水平上。自从1994年以来,韩国学界也开始出现有关甲午战争研究的大量成果,就是因为随着1894年东学农民战争研究高潮的到来,开始重新关注甲午战争,包括对日本学界的研究成果进行再批判性研究。

此前有关日本外交政策及甲午战争的基础史料,主要还是1945年以后整理出版的日本官方史料、外交文书、军队文书等。韩国学界整理出版的《驻韩日本公使馆记录》对于相关研究的深入开展产生了重要影响,而1994年纪念东学农民战争100周年之际刊行的《东学农民战争史料丛书》,更是在此后二十多年间产生了许多重要的研究成果。^③ 此外,还有与外交史相关的基本文献解题,以及阐明东亚国际秩序结构性变化的研究成果。^④ 关于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以来韩国学界有关甲午战争的研究倾向,大体可以归纳为如下几个方面:

1. 甲午战争爆发经过及日本虐杀中韩民众

关于甲午战争的开战过程,多是批判日本学界最近的研究倾向,并从多方面深入探讨了日本侵略过程的阶段性变化及与其相关的军事、外交。

崔硕莞早在其东京大学博士学位论文中就分析了19世纪80年代明治政府东亚政策的变化,并在2000年以后的研究中进一步探讨了甲午战争的开战过程。他指出有关甲午战争开战的研究有两大倾向,一是认为日本政府一开始就为引发战争而不断挑战清朝从而最终导致了战争,也就是将甲午战争理解为明治前期对外扩张政策的结果。至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出现的另一种倾向,则认为甲午战争其实是一场偶发性战争,即将甲午战争理解为明治前期清日合作政策亦即非扩张主义外交路线的瓦解过程。^⑤ 崔硕莞集中批判了上述两种倾向中的后者。他指出,当时

^① 金钟俊:《殖民史学的韩国近代史叙述以及韩国合并认识》,《历史学报》第217辑,2013年;田保桥洁著,金钟学译:《近代日鲜关系的研究》上,一潮阁,2013年。

^② 檜山幸夫编著《近代日本の形成と日清戦争——戦争の社会史》、雄山閣、2001年;大沢徹也『庶民のみた日清・日露戦争——帝国への歩み』、刀水書房、2003年。

^③ 国史编纂委员会编:《驻韩日本公使馆记录》1—28,国史编纂委员会,1986—2000年;历史问题研究所、东学农民战争百周年纪念事业推进委员会编:《东学农民战争史料丛书》1—30,史芸研究所,1996年。

^④ 国史编纂委员会从1986年起就陆续刊印了《驻韩日本公使馆记录》,包括影印本40卷、原文及翻译本26卷、索引2卷。通过该资料与明治时期《日本外交文书》,可以了解当时日本外交侵略的内幕,其中包括驻朝日本公使馆与外务省往来文件、电报,包括有关甲午改革及甲午战争动向的原始报告文件,从而大大提高了相关外交史研究的水准。有关韩末外交史文献的介绍,最早有李用熙《近世韩国外交文书总目(外国编)》(韩国国会图书馆,1966年),此后更加综合与系统的文献介绍则是金容九、河英善合编的《韩国外交史研究》(罗南出版,1996年)。

^⑤ 高橋秀直『日清戦争への道』、創元社、1995年;大沢博明『近代日本の東アジア政策と軍事——内閣制と軍備路線の確立』、成文堂、2001年。

首相伊藤博文与外务大臣陆奥宗光的开战战略并非所谓临机应变之措施,而是试图通过将朝鲜内政改革要求提高到极端,从而挫败清朝的对日交涉意志进而消除英、俄仲裁余地的一种“交涉雾散战略”。^①就是说,日本的开战外交不仅符合当时驻朝鲜之日本外交官的开战要求,而且也是考虑到对英条约改正的因素,逐步地走向了战争。崔硕莞的上述研究固然有针对当时日本学界战争偶然爆发论的痛烈批判意义,却仍是延续了日本学界在战后对明治外交侵略主义性质的批判立场,只是相对地深入地揭示了其侵略过程而已。

其他研究者则强调了日本在对清战争过程中大规模虐杀中国与朝鲜民众的一面,从而对战争性质进行了新的诠释。姜孝叔利用日本防卫省资料,具体探讨了甲午战争期间日本军队镇压与虐杀东学农民军的史实,指出1894年9月以后日本军队在朝鲜全国的讨伐与虐杀行为,绝不仅仅是为了确保兵站线安全,而是作为占领者对被占领地非武装居民的虐杀,进而大胆地提出了这场战争应该是朝清日战争的观点。这种解释试图摆脱清、日战争的视角而强调朝清日战争尤其是日本与朝鲜之间战争的一面,却仍未能摆脱从国家层面来诠释的局限性。^②

上述的研究倾向,把朝鲜视为甲午战争的直接被害地区,并深入考察战场现地实际情况,其意图值得肯定。^③这样的努力,当然是为了通过考察战争期间民众所经受的残酷战祸情形来了解战争背后的日常生活,与日本学界近来关注日本人的战争体验、残酷记忆以及战争实况等问题的研究倾向也可以说是颇为一致。问题在于,甲午战争并不仅仅是国家层面的问题,而应该进一步关注日本帝国侵略与东亚民众之间的对立,亦即应该关注“民众层面的战争”内容。

2. 清日外交史研究的新倾向:重新审视“属邦论”以及概念史

甲午战争的另一个研究主题,就是关注19世纪80年代以来清日两国有朝鲜问题的对应以及朝鲜对国际关系认识的变化。首先,就是在朝鲜与清朝的关系领域,即便是在前近代的朝贡体制之下,内政与外交仍是自主,以及如何评价19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的朝鲜属国化政策的问题。与此前的研究不同,具仙姬的研究系统地分析了朝清关系与“属邦论”。^④她通过考察1894年朝鲜政府内部有关清国借兵论的争论以及对清认识,指出对清借兵决定是出于试图维护王权的高宗以及试图维护既得利益的闵氏威族政权实权人物闵泳骏与外压势力之代表袁世凯之间的勾结,是顺应清国属邦体制的结果。

她认为从1882年壬午军变以来直至甲午战争期间清国对朝鲜施加了政治、军事暴力的外压,是阻碍朝鲜社会近代化的一个决定性外因,并对清国清除朝鲜国内反清势力以及假托朝贡体制而实质上具有帝国主义侵略性质的对韩政策进行了痛烈的批判。她指出在前近代朝贡关系中存在朝清“属邦问题”,到了近代国际公法体制则被清国与日本所利用,进而成为朝鲜最终沦为近代殖民

① 崔硕莞『日清戦争への道程』、吉川弘文館、1997年;《清日战争时期日本政府的东亚秩序再编政策——条约改正外交与6.2朝鲜派兵决定》,《日本历史研究》16,2002年;《日本政府与朝鲜内政改革案(1894.6)》,《日本历史研究》21,2005年;《日本政府的清日开战政策——第一次开战企图及其挫折》,《中国近现代史研究》33,2007年;《日本政府与清日战争开战过程——列强干涉与日本的交涉雾散战略》,《日本历史研究》29,2009年。

② 姜孝叔:《清日战争时期日本军对东学农民军的镇压》,《开放精神人文学研究》6,圆光大学人文学研究所,2005年;《黄海、平安道的第二次东学农民战争》,《韩国近现代史研究》47,2008年;《清日战争时期日本军对朝鲜民众的镇压——以日本军的“非法性”为中心》,王贤钟、大日方纯夫等:《清日战争期间韩中日三国的相互战略》,东北亚历史财团,2009年。

③ 车琼爱:《通过清日战争当时的战争见闻录来看战争地区民众的生活》,《明清史研究》28,2007年;《清日战争当时朝鲜战争区域的实际状况》,《韩国文化研究》14,梨花女子大学韩国文化研究院,2008年。

④ 宋炳基:《近代韩中关系史研究——19世纪末的联美论与朝清交涉》,檀大出版部,1985年;权锡奉:《清末对朝鲜政策史研究》,一潮阁,1986年;金正起:《清的对韩政策(1876—1894)》,《1894年农民战争研究》3,1993年;具仙姬:《韩国近代对清政策史研究》,图书出版慧眼,1999年;殷丁泰:《清日战争前后朝鲜的对清政策与朝清关系的变化》,王贤钟、大日方纯夫等:《清日战争期间韩中日三国的相互战略》。

国家的一个因素。这样一种研究倾向,与近年来中国学界有关李鸿章对朝鲜政策的评价显然大相径庭。中国学界的研究多是指出强化宗藩关系的措施不无保护朝鲜进而保全朝鲜国家主权及领土完整的意义,因而强调了其中肯定性的一面。^①

另外,近年来的概念史研究超越了三国关系史的层面,开始关注当时知识分子的国际局势认识及世界观,并探讨“属国”“独立”“文明”“国民”等主要概念及其嬗变。^② 这些研究批判了此前东亚政治外交史研究中东亚是单方面地接受西欧学界概念的观点,试图更加深入系统地揭示东亚各国接受近代概念及其认识变化的过程,可以说开拓了概念史研究以及近代话语研究的新领域。

3. 朝鲜甲午政权的依赖日本及其近代性论

韩国学界在有关甲午战争问题上争议最多的部分,便是甲午改革的性质。1894年7月,日本为挑起对清战争,强行占领朝鲜王宫之景福宫并更换了政权,即所谓景福宫占领事件。对于此后成立之甲午政权的改革,究竟是依赖日本的他律与依附的改革还是自律的主体改革,一直众说纷纭,其焦点就在于甲午改革的对外依赖性以及改革的近代性问题。^③ 因此,在韩国近代史研究领域,有关甲午改革的研究就日益受到了重视。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韩国学界有关甲午改革的研究呈现出两种不同倾向。一是认为随着日本对清战争的胜利以及对朝鲜保护国化政策,甲午改革仍是属于对日依附的性质。这种观点强调日本的保护国化政策,并探讨了货币制度改革、大规模借款等日本经济侵略的事实。^④ 1894年7月17日,日本政府决定暂时选择所谓“乙策”为此后处理朝鲜问题的原则,这个“乙策”则多被解释为试图将朝鲜变为名副其实的日本保护国的方针。^⑤ 问题在于,由于西方列强的干涉,当时日本只能通过驻朝全权公使来行使对朝鲜内政的干预。当时日本的外交政策还不能落实具有实质意义的保护国政策,也未能设立类似1905年以后日本保护国统治那样的政治干涉机构,因此上述的研究可以说并未能触及问题的实质层面。^⑥

另一种观点认为甲午改革大大改变了传统朝鲜社会,在国内层面完成了近代社会乃至近代国家的改革,主要包括作为国家制度改革的行政体系及地方制度的变化、作为社会改革的身份制度改革,以及实施近代审判制度、财政货币制度近代化,农业领域地主制的发展以及流通经济的变化等内容。^⑦ 这种观点一方面承认由于日本侵略而未能完成独自的改革,同时主张应在韩国社会内在

① 朴尚洙:《最近中国学界的韩中关系史研究视角及其观点》,《大邱史学》95,2009年,第11—19页。

② 裴允燮:《开港期的对清意识及其变化——以民众界的动向为中心》,《韩国思想史学》16,2001年;金度亨:《大韩帝国初期文明开化论的发展》,《韩国史研究》121,2003年;崔主振:《清日战争时期知识人的国际情势认识及其世界观》,《亚细亚文化研究》26,2012年;郑容和:《文明的政治思想——俞吉濬与近代韩国》,文学与知性社,2004年;朴羊信:《近代日本的“国民”“民族”概念的形成及其展开》,《东洋史学研究》1004,2008年;金圣培:《儒教的思维与近代国际政治的想象力——旧韩末金允植的儒教式近代受容》,创批,2009年;玄光浩:《韩国近代思想家的东亚认识》,图书出版先人,2009年。

③ 有关甲午改革研究史的成果整理,主要有郑昌烈《甲午农民战争与甲午改革》,《韩国史研究入门》(第2版),知识产业社,1987年;河元镐:《甲午改革——自主性与亲日性》,《历史批评》1991年秋季号(14号);朱镇五:《甲午改革的新理解》,《历史批评》1994年秋季号(26号);李培榕:《关于开化思想、甲申政变、甲午改革的研究现状及其课题》,《韩国史论》25,国史编纂委员会,1995年;王贤钟:《近代化运动的开展:甲申政变与甲午改革》,《新韩国史入门》下(第3版),知识产业社,2008年。

④ 金正起:《甲午更张期日本的对朝鲜经济政策——以日本借款政策为中心》,《韩国史研究》47,1984年;吴斗煥:《韩国近代货币史》,韩国研究院,1991年。

⑤ 柳永益:《甲午更张研究》,一潮阁,1990年;柳永益:《东学农民蜂起与甲午更张》,一潮阁,1998年;金贤锡:《甲午改革期日本的朝鲜保护国化企图与日本人顾问官的活动》,《韩国近现代史研究》2003年春季号,24辑;金贤哲:《清日战争开战时期日本对朝鲜政策的名义与实际:以日本外务省的构想与驻韩日本公使馆的活动为中心》,《日本研究论丛》19,2004年。

⑥ 王贤钟:《韩国近代国家的形成与甲午改革》,历史批评社,2003年,第171—208页。

⑦ 金容燮:《韩国近代农业史研究(1)》(增补版),知识产业社,2001年;《韩国近代农业史研究(2、3)》,知识产业社,2004年;都冕会:《韩国近代刑事裁判制度史》,青史,2014年;慎镛履:《东学与甲午农民战争》,一潮阁,1993年。

发展脉络上从阶段性的眼光来考虑这一问题。

至于甲午改革在甲午战争期间所起的作用,则大多持批判的态度。1894年10月以后甲午政权针对农民军的镇压与虐杀政策尤其被指责为一个致命的缺陷,被评价为主动清除抵抗日本侵略的民族主义势力从而丧失了能够形成民族团结理念的社会基础。^①与甲午改革及其与日本关系的研究直接相关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1895年10月明成皇后闵妃被杀事件。闵妃被杀事件不仅暴露了日本帝国主义的冒险主义侵略政策及其帝国主义侵略性质,同时也暴露了甲午政权的对日依赖性。尽管甲午政权的对日依赖不无改变朝鲜传统秩序及其社会风俗的近代化意图,随后高宗及其亲信势力的俄馆播迁行动,最终还是导致亲日甲午政权的崩溃,日本的侵略政策也随之遭到了挫折。^②因此,可以说甲午改革仍是属于依附外国势力的性质,最终给近代国家的发展带来了严重的障碍。

四、加强韩中学术交流进而探索东亚民众联合

1894—1895年的甲午战争,导致了日本的帝国主义化与中国的半殖民地化以及朝鲜的殖民地化危机。目前在韩国学界引领日本史研究的第一、二代研究者们大多是日本或欧美归国留学生,因此韩国学界的甲午战争研究就不可避免地受到了他们所留学国度研究倾向的影响。^③直到最近时期,才开始出现摆脱日本史视角的甲午战争研究成果,进而开始形成独立的学风与方法论,包括关注甲午战争时期对东亚民众的虐杀、从东亚国际关系史脉络来理解甲午战争并重新诠释甲午改革等。^④另一方面,韩国与日本学界的学术交流一直十分活跃,而与中国学界几乎没有交流,直到最近时期才出现了若干成果。^⑤尽管这些成果尚未对两国学界产生重要的影响,随着韩中学术交流的深入进展,应该可以期待两国学界开展有关甲午战争的共同研究。

以后的有关甲午战争研究,首先应该重点进行有关战争定义与性质及其现实意义的深入探讨。应该看到,甲午战争爆发于1894年7月并一直进行到1895年4月,战争却没有因两国媾和的《马关条约》而告终结,因为战线进一步扩大到台湾,而日本对台湾居民的虐杀则持续到1895年12月。作为战争的结果,日本获得了辽东半岛与台湾,并获得了日后将朝鲜保护国化的契机,清国则向包括日本在内的西方列强进一步开放,丧失了更多的利权。19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册封体制彻底崩溃,甲午战争导致了东亚国际秩序的巨大变化。

从韩国史的角度来展望此后有关甲午战争的研究,首先应该认识到这场战争不仅是清日两个国家层面的战争,还是东亚民众层面的战争。唯有如此,才能如实地揭露1894年10月日本军队镇压与虐杀东学农民军的事实,揭示韩国自主近代化改革遭受挫折的历史,进而重新探讨当时日本作为战争口实而提出的所谓“朝鲜独立”问题。

① 韩国历史研究会编:《1894年农民战争研究(4)》,历史批评社,1995年;《1894年农民战争研究(5)》,历史批评社,2003年;王贤钟:《韩国近代国家的形成与甲午改革》,历史批评社,2003年,第367—399页;郑昌烈:《甲午农民战争》,图书出版先人,2014年,第287—318页。

② 崔文衡等:《明成皇后被害事件》,民音社,1992年;崔文衡:《揭示明成皇后被害的真实》,知识产业社,1996年。

③ 朴英宰:《回顾与展望(日本)》,《历史学报》132,1992年,第159—172页;朴薰:《日本近现代史研究动向》,《历史学报》215,2012年,第289—308页。

④ 姜声鹤等:《龙与武士的决斗——中日战争的国际政治与军事战略》,Rebook,2006年。

⑤ 陈伟芳著,权赫秀译:《清日甲午战争与朝鲜》,白山资料院,1996年;王元周:《韩国近代移行期华夷观的变化与民族意识》,延世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3年;权赫秀:《近代韩中关系史的再照明》,白山资料院,2007年;王贤钟、大日方纯夫等:《清日战争期间韩中日三国的相互战略》。

其次,有关甲午战争的研究还应强调亚洲民众的被压迫的痛苦事实,而不仅仅是日本近代史的近代文明化以及明治近代国家诞生的视角。为此,应该重新复原并审视散落在韩中日三国的有关甲午战争纪念物,并在东亚民众的立场上共同确立一个超过各自民族国家的共同历史认识。^①甲午战争给予今天韩中日东亚三国寻求和平的努力的历史教训,端在于此。

[作者王贤钟,韩国延世大学历史文化学科教授;译者权赫秀,辽宁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责任编辑:高士华)

《抗战时期中国的后方社会——战时总动员与农村》翻译出版

笹川裕史、奥村哲著,林敏、刘世龙、徐跃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12月出版,21.1万字,45元

在日本学术界,既往的抗战史研究大多集中在日本侵略战争对中国社会造成的人力、物力方面的直接损失,而忽略了民众层面的社会变迁。本书作者以四川省为例,利用大量档案资料,民众陈情书、诉状,以及当事人的回忆录等史料,详尽描绘了普通民众在战时重负下的苦难及其因应,勾勒出战时大后方基层社会的混乱及变化,揭示了战争环境下国家与个人利益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展现了抗日战争期间大后方的立体图景。另外,从战时与战后问题的连续性这一视角出发,作者还力图探讨战争对基层社会带来的长期影响,并通过比较研究,分析了20世纪的总体战分别给中日两国截然不同的基层社会所带来的变化。本书在日本出版后,即引起学术界极大关注,值得在中国翻译出版。(马晓娟)

^① 郑根植:《从中国甲午战争博物馆来重新审视东学农民战争与清日战争:为了1894年东北亚战争的概念化》,《亚洲Review》第4卷第1号(通卷7号),2014年;中日韩三国共同历史编纂委员会编:《超越国境的东亚近现代史》上,第2章第2节“甲午中日战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